

上海交通大学
现代传记文库

梁庆标 选编

The Biographer's Revenge

Essays of Modern Western Research on Life Writing

传记家的报复

新近西方传记研究译文集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梁庆标 选编

The Biographer's Revenge

Essays of Modern Western Research on Life Writing

传记家的报复

新近西方传记研究译文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记家的报复：新近西方传记研究译文集 / 梁庆标
选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2

(现代传记文库)

ISBN 978 - 7 - 5495 - 7008 - 9

I. ①传… II. ①梁… III. ①传记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05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0140 号

出品人：刘广汉

策划：魏东

责任编辑：魏东

装帧设计：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 bbtpress. 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31260822 - 882/883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间房工业区 邮政编码：102600)

开本：690mm × 960mm 1/16

印张：25.75 字数：350 千字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主体的复归与传记的挑战

(编译前言)

1978年,美国著名传记家、《亨利·詹姆斯传》的作者利昂·艾德尔在夏威夷大学创办了《传记》杂志,这是西方国家第一份从事传记研究的专业刊物,它标志着传记研究进入了大学校园和学术殿堂,传记理论停留在传记家的感想和经验总结,或者由小说家来评价传记的时代成为过去。三十多年来,一批传记学者,承袭了二十世纪初由伍尔夫、斯特拉奇、莫洛亚等人开启的“新传记”传统,清理了从约翰生乃至普鲁塔克发端的传记理念;另一方面,又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史学、心理学、哲学和文化批评中广泛吸取养分,对传记理论加以发展。传记研究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并融入了当代国际学术的潮流,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传记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类,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传记理论日益兴盛,至今竟能自成一家,与历史、文学批评鼎力相持。

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或有意抬高传记研究的地位。一个重要依据在于,众多专门从事传记理论和批评的学者一直在这一领域探索、开拓,并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如菲利普·勒热讷、詹姆斯·奥尔尼(James

Olney)、保罗·让·埃金(Paul John Eakin)、托马斯·库塞(Thomas Couser)、奈杰尔·汉密尔顿(Nigel Hamilton)、西多妮·史密斯(Sidonie Smith)等;而且许多哲学家、文学家看似远离甚至贬低传记,其实也都在从不同角度或公开或隐秘地与传记进行对话、争辩,如福柯、罗兰·巴特、德里达、德曼、纳博科夫、博尔赫斯、君特·格拉斯、库切等人。特别是对后者而言,无论他们主张解构还是强调虚构,以主体的现实性、历史的真实性为标志的传记都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确然存在,无人可以对其视而不见。可以说,他们所有的言论其实都是围绕着“自我”、“真实”而发,所谓的消解、颠覆等标新立异之论大多不过是修辞技巧,或是他们言说世界的一种具体方式,根本无法掩盖他们对现实人生的依恋和自我留存的努力。

我们不要忘记尼采早就说过的话:“渐渐地,我弄清楚迄今为止每种伟大的哲学是什么了:它们是作者的个人自白,以及某种无意识的和未被觉察的回忆。”^①也就是说,那些看似最无个性的抽象话语都深深地镌刻了作者的自我烙印。与此相似,叶芝如是说:“所有的知识都是传记……每个心灵都是独一无二的。”^②这些似乎都是对那些“反传记”者的预先回答,因为抹杀作者与文字之间的关系,就等于杀死了作者的存在。人们渐渐明白,撬动这个星球的真正“阿基米德点”,其实不在世界之外,而在人的内心之中,即人的意识与自我意识。因此,理解传记问题的基本视点就是,从原则上看,无论一个人在表达什么、掩饰什么,他总是在传达自身,他的所有思想、言论与行为都存在于一个富有弹性的传记之网中。而且,不管如海神普罗透斯(Πρωτεύς / Proteus)般如何变幻,他总是或暂时会有一定的形体和边界,由

① 尼采:《超善恶:未来哲学序曲》,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9页。译文参考英译作了修改。

② 参见 James Olney, *Metaphors of Self: The Meaning of Autobi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2。

此也可能被传记家/自传者——理查德·艾尔曼称之为“不停追逐的猎犬”^①——所捕获。

当然,现实往往是,“没有捕获到的东西往往多得多”,传记很难如成熟的小说或“佳构剧”那样完美,它常常面目驳杂,品质良莠不齐,因此容易受到批评。有人会批评传记过于文学化、虚构化,违背了客观性和真实伦理,与虚构无异;有人则批评传记缺少文学性和艺术性,只是琐碎的文献资料,是“次等文类”,根本无内涵和美感可言。传记两面都不讨好,其实也正暴露了批评者的内在矛盾与悖论,恰如王尔德曾讽刺的:“十九世纪对现实主义的憎恶,犹如从镜子里照见自己面孔的卡利班的狂怒。十九世纪对浪漫主义的憎恶,犹如从镜子里照不见自己面孔的卡利班的狂怒。”^②在他们的不同镜像中,传记呈现出被扭曲的面貌。

要公正地对待传记,就必须摆脱上述偏见,细致考察传记中的各种“症候”,就要认识到,造成传记“诗与真”纠葛的原因异常复杂,政治观念、道德伦理、生理机制、现实利害、审美追求等等,都是使传记者容易成为或难以成为传主的“犹大”的重要因素。然而,这些都不能构成否定传记的理由,而恰恰应是传记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向度。显而易见的是,经过了后现代观念的冲击,当代读者不再那么容易受骗,他们大多不再将传记视为装有“透明的事实材料”的容器,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其中事实性与审美性、客观性与主观性、外在性与内在性的交互影响,将其视为复杂人性的个体微观展现。也就是说,现代传记是将人生转化为艺术(life into art)的加工整合,使琐细、重复、杂乱的生平具有了整体性和秩序,便于理解和把握,体现了艺术

① Richard Ellmann, *Golden Codgers: Biographical Speculations*, London: Oxford UP, 1973, p. 1.

② 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3页。

创造的过程,但这一艺术与虚构技艺大大不同,要遵照传记本身的逻辑与性质:传记书写不过是将如艺的人生用必要的艺术手法进行的呈示,在根本的层面上,艺术从属于真实。因为如果深究传记的内在机理及其与人生本质之关系的话,应当可以说:人生本似艺(life as art),传记即人生。现实人生中的表演性、虚构性一点都不弱于所谓的虚构文本,二者本质相同。传记与人生、文本与世界实则融为一体,不会因为文本中的艺术修辞而丧失传记的认知价值,传主、传记家等主体的人格特性反而由此得以彰显。斯坦利·费什就说过:“自传者无法撒谎,因为无论他们说什么,无论如何虚假,都是有关他们自己的一种真实,不管他们知道与否。”^①这就超越了对简单的传记事实的真伪考辨,从更高的角度对自传者的心理与自我表现的整体性加以理解;而在严肃的传记中,即使传记家难以做到非常准确、全面,但所叙都与传主有关,至少能表现出传主身份、人格的某些侧面。“就如同人自身可以具有人造器官但并非虚假的人一样,自传也可以具有虚构性但并不因此而成为小说。”^②这条界线隐现其间,无法被抹除。

传记饱含着人类的生命气息,其中的一言一行、一枝一节都渊源有自,它无法凭空出现或被“虚拟化”,它最贴近人类生活的本真,社会性是它的根源和母体,各种修辞和技艺都内在于这一社会机体的网络之中,个体与社会在此纠缠得如此紧密,根本无法分离。由是观之,要理解和欣赏传记,依然需要破除的执念就是:斤斤于传记书写中的遗漏、不实或隐讳之处,由此否定传记的真实性与历史价值,甚至宣判其“死刑”。殊不知,对传记的观照与批评需要退一步看,站在传主活动的舞台之外、之上,将其置于更大的背景

① 参见 Sidonie Smith and Julia Watson, *Reading Autobiography: A Guide for Interpreting Life Narrativ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p. 15。

② Thomas Couser, *Altered Egos: Authority in Americ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51.

之中,力图以批评家“上帝般”的“全知视角”来审视传记家与传主的“有限视角”与叙述技艺。研究者需要做的,就是综合考量各种要素,探究传主形象的发生与呈现过程——这一充满“对话、争斗和协商”的过程甚至比结果更接近于传主的真相。而且在这一研究进程中,要具有充分的比较意识,尽可能在不同传记家笔下、不同传记中发现传主的多重面目与身份——人的真相大概正在于此。

传记写作被视为一门“艰险的艺术”,传记研究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基本原则、法度虽在,但实践难度却超乎想象。研究者既要有史家的严谨、耐心和勤奋,善于收集、爬梳各方面的材料,倾听各方的声音,力图超越于传记作者的视野之上,同时又要有艺术家的敏锐和细心,能够从字里行间和叙述修辞中发现“隐微之义”,由此文史兼备、内外结合,方能理解作者材料、意图与修辞的结合方式,也即传记艺术之精妙。同时,现在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传记是跨学科的文类,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这对传记批评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大多数传记家可能具有文学素养,可归属于文学家一门,但传主(或众多自传者)则不拘身份,不拘领域,包罗万千,是自古以来复杂的人生存在的呈现。由是,要想把握传记的意图以及深层内涵,传记批评就不能拘泥于单纯的语言修辞、社会语境表层,还要一定程度上具备传主所从事的职业或专业上的知识,方能与传记家、传主展开真正的对话。因此,现代传记批评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如针对政治传记、哲学传记、科学传记、法律传记及文学传记等不同形式进行的专门研究,研究者也来自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虽然对象不同,但都在人性这一点上汇通,由是均能开人耳目。而在研究范式与角度上,也表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特征,如主体建构、身份认同、自我意识、意图功能、叙述伦理、话语修辞、宗教观念、意识形态、性别政治、法律权益、文化产业、网络传媒等等,传记也表现出了足够的含蕴和空间,值得研究者

进一步关注。

纵观人类历史,人性在某些方面或许有进步发展,但基本的模式似乎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当代的生者大都能在往时的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不过在“影响的焦虑”下,每个人的表现又各自不同,这就构成了风情万千的世态人生。所以格奥尔格·米施指出,自传研究的落脚点就是:“将无限变化的自传写作形式同人类心灵的历史联系起来,并置于历史语境下进行审视。”^①传记研究的整体都应当如是。对于个体人生的价值,克罗齐曾斩钉截铁地说:“谁想要从历史中删除个人,请认真观察,就会发现他或者一个未删除,或者连历史本身也一并删除了。”^②传记研究体现的就是对个体、人性的充分尊重,可以让人们在这个忙碌冰冷的世界里找到心灵的知音。在此意义上必须提及的一点是,基于传记的这种普遍人性特征,研究者不能仅仅以“精英主义”的态度认识传记,将其局限于若干伟人、名人身上,这大大背离了传记的本旨。精英/大众,高雅/通俗,精致/粗犷,文字/图像,实体/网络,无论传者何种地位、身份,传记何种风格与形式,都不能被排除在外。伟人与精英的传记固然值得关注,甚至可谓人生的典范,但西谚说得好:“仆人面前无伟人。”或者如蒙田谈到的,当庞培进入雅典时,人们曾送给他一句话:“正因为你成了神,更应该认清自己是人。”这正是告诫自傲者,将其拉回自身的脱冕意识。反过来说,微不足道的凡人的传记至少都具有民族志、人类学的价值,因为每个个体的“微观宇宙”都有自己的轨迹和光芒,他们共同汇成了变幻万千的大宇宙,书写着关于生命本身的秘密。

最后让我们回到普鲁塔克——他可谓传记这一生命体的一个起点,他早就认识到了传记的存在论意义,认为生命的价值就是“显露”而非掩藏躲

① Georg Misch, *A History of Autobiography in Antiquity*, London: Routledge, 1950, p. 4.

②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避,“在我看来,生命本身——事实上一个人的出生和成形——都是神明为了他被人知晓而给他的礼物”。而且仅仅“存在”是不够的,还要被感知,“‘成为’并非有人所说的‘进入存在’,而是从存在进入被知晓”。^① 用埃金的话说,“自传式生存”就是人的本质,人的一言一行都染上了自我的色彩,人本身就是一种体验性存在,形诸文字或图像的传记正是人之所能“成为”人,并被人长久知晓的必要路径,而传记批评与研究正是对这一复杂的生成状态、“显露”过程的探究,意义自然非凡。

传记理论与批评在西方方兴未艾,为我们拓展了丰富的研究空间,国内学界对此已经有所关注,如杨正润教授在此领域多有著述,也力图建构现代理念下的“传记诗学”。遗憾的是学界对此还缺乏相应的介绍与呼应,许多青年学者也苦于缺乏理论参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记诗学在国内的发展与深入。鉴于这种情况,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编译了这部《传记家的报复:新近西方传记研究译文集》。本书共收录文章十七篇,源自英、法、德、俄四语种,基本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著述,均属于传记研究兴盛时代的成果:理论建构与文本分析兼备,宏观评述与微观细读皆有,既总结传记发展史上的问题,又力图阐明未来的发展方向,作者大都是精研传记之专家、著名传记作家或青年学者,各有其代表性。细心的读者也会看到,多数选文研究的都是自传问题,这是当代传记研究基本倾向的一个反映,并非有意偏颇;特别要指出的是,其中有两篇中国古代自传的研究成果,均出自汉学家之手,相信对理解中国传记的整体都可资借鉴。当然,其具体解读方式是否合理、功力或识见高下如何,读者在书中自然能看出端倪,编者不再

^① 普鲁塔克:《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普鲁塔克文选》,包利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1页。

赘言。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经历了“文化转向”和“理论之后”的二十一世纪,传记阅读与研究进入了人们的中心视域,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本书通过译介西方学者的这些研究文章,就是试图传达这种声音:面对各种消解理论和“反人本主义”观念,在繁盛多元的传记现象的基础上,传记研究者们已然接受了诸种现代理念,思想更加开放,这使得那些“反传记”观念反而显得保守顽固,这似乎就是他们提出的挑战,标志着作者、主体和真实在现代观念下的复归,或者用约翰·豪尔普林的话说:“传记家的报复!”

说到消解理论被传记事实所报复,保罗·德曼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的《涂抹真面的自传》(1979)常被视为经典的“反自传”批评文章,甚至被认为“发出了自传终结的信号”。然而在德曼死后,人们发现了他在二战初期为纳粹所写的近两百篇“反犹太主义”文章,这一传记事实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其著述的理解:“德曼对作者责任的拆解和对自传式自我的逃避,受到了个人需要的驱动:他压制自己的过去的需要。”^①确实,如豪尔普林在《传记家的报复》一文中所指出的,解构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逃避现实的形式,它试图摧毁传统的价值观、社会契约和自然法则等概念,以便不必再去对付它们,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自欺欺人,那些传记事实会在历史的尘埃中静静地等待着复活,并做出强有力的反击。因此,豪尔普林引大卫·雷曼之言:“如果反传记的文学理论最终是由于发现其领袖人物有严重问题的传记事实而被打败,那倒是一种诗意的正义。”对此,我们也深信不疑。

正是怀着这种信念,来自新加坡和国内十几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数十位传记学者共同承担了这一艰巨的翻译任务。各位译者都有自己的语言背

① Linda Anderson, *Autobiograph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15.

景和专业所长,也都能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完成翻译任务,令编者非常感动,在此谨致诚挚谢意,他们的名字都列在了相应的译文中,此处不必再罗列。此外,刘佳林、尹德翔、唐玉清、黄晓艳等老师也受邀承担了部分译文的校对工作,使文章颇为增色。文集的版权因多数作者和版权方的慷慨应允而得以解决,对此书中自有交代,对他们的帮助亦深表感谢。内子的督促、协助和小儿的不时扰闹也促进了本书的完成,照例也要说声谢谢的!

归根结底,传记乃生命之艺术,这部关于人生的著作凝聚了太多人的心血,正是他们的温情和鼓励使我没有在困难的时候放弃,由是,本书几经曲折反复,最终方可完成,并呈现在诸君面前。当然,由于视野的局限、版权的限制、时间的仓促等问题,译文集不能非常全面客观地呈现西方传记研究的状况,尚请读者体谅。理论翻译之难众所周知,虽然所有译文都经过多次译校修改,但译笔难免有不甚通达之处,读者如能再参照原文进行取舍,使本书起到“媒”的作用,也亦知足。

梁庆标

于望庐轩

2015年4月10日

目 录

主体的复归与传记的挑战(编译前言)	梁庆标	i
传记家的报复	约翰·豪尔普林 著/杨正润 译	1
传记与理论:通向诗学之路	艾拉·布鲁斯·奈德尔 著/王军 译	23
客观传记的神话	苏珊·崔杰尔 著/周凌枫 译	62
超越极限	宝拉·R. 贝克西德尔 著/陈诗迪 译	93
新千年,“新传记”	伊丽莎白·波德尼耶克斯 著/刘卉 译	120
一个传记作者的坦白	利昂·艾德尔 著/赵山奎 译	136

自传的指涉美学	保罗·让·埃金 著 / 李凯平 周佩珩 译	158
自我塑造与世界塑造	杰罗姆·布鲁纳 著 / 许勤超 译	188
自传的面目	劳拉·马库斯 著 / 梁庆标 译	204
政治剧场里的自传话语	西多妮·史密斯 著 / 俞冰 译	220
化蛹成蝶：自传材料到故事的叙述、身份与自我重构	马克·弗里曼 著 / 梁庆标 译	250
“欲火森林中的行尸走肉”：自传和女性身体的建构	雪莉·纽曼 著 / 沈忱 译	272
对抗死亡：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自传书写	苏珊·本布里奇 著 / 李凯平 陈亚斐 译	297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忏悔录	尼古拉·卡赞斯基 著 / 朱剑利 贾锐 译	319
中国自传的成长生态	吴百益 著 / 蒋亭亭 译	345
中国自传的面貌	鲍吾刚 著 / 朱更生 译	361
回忆转生与个人自传体神话：以汤婷婷为例	张寅德 著 / 朱燕 译	376

传记家的报复*

约翰·豪尔普林 著

杨正润 译

诗人的一生是他的作品。

——田纳西·威廉姆斯

—

米歇尔·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一文里把故事的叙述者从人降低为一个形容词。这位后现代的高级祭司不说作者,只说“作者功能”。他问道:“谁在说有什么意义呢?”他认为作者是“写作游戏中的死人”。

* 本文选自《文学传记:问题与对策》(John Halperin, “The Biographer’s Revenge,” in Dale Salwak ed., *The Literary Biography: Problems and Solutions*,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pp. 149-166), 承蒙作者授予版权。本文的两个不同版本,分别发表在《澳大利亚大学语言文学协会学报》1988年第lxix期和《传记》1989年第xii期,这里采用的是经过修订的最新版本。

约翰·豪尔普林(John Halperin),美国传记家、学者,克莱蒙研究大学教授,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荣誉研究员,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美国会员之一(1984年),两次获得古根海姆奖。主要研究领域:传记,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与文化。著有《乔治时代名人传》(1995)、《小说家的青年时代》(1990)、《简·奥斯丁传》(1984)、《吉辛:书中人生》(1982)等。

结构主义者,特别是罗兰·巴特,宣称批评的任务并非阐释作品和作者的关系,也不是通过作者의思想和经历分析作品,而只是通过结构分析作品的构建、内在形式及其语言关系所发挥的作用。后现代主义发明了作者的死亡和消失,避免涉及他或她,无视写作的行为和作者可能要表达的意义。后现代主义者试图想象出文本的总体境况,既包括这一文本得以播散的空间,也包括文本得以显露的时间。在作者既不可见又无关之论断的基础上,他们进而试图对作者死亡所留下的空缺加以占领和描述,追随作者消失所分布的裂缝,寻找他的消失所打开的空洞。

福柯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作者已经停止存在,为什么不把他的名字从作品中完全去掉呢?他说:一封私信、一份契约、一张贴在墙上的无名告示,也许都有一个签名者、一个担保人或一个写作者,但是这些“文本”没有一个有作者。同样的,文学作品也应当看作没有作者。福柯的结论是:全部的作者概念不过是读者造出来的设想。

尽管被宣布死亡,对福柯来说作者仍具有潜在的“重大危险,虚构的东西就以这种危险威胁我们的世界”。他宣布我们必须“把传统的作者观念完全撤除”。他坚持认为:作者并不“先于”他自己的作品,“它是某种虚构原理”,以此强迫读者限制、排除——最恐怖的是选择意义。福柯说:作者“阻止虚构作品中的自由流动,自由操作,以及自由写作、拆散、改写”。换句话说,作者是一种麻烦,批评家完全可以无视其存在。在福柯看来,一部小说的作者,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品”或阻挠“添加意义”的角色。承认他的存在减少了批评家希望获得的解释途径。最后福柯预言,作者和全部著作权概念都将消失,这给了批评家一条到达“多义”文本的明确而简单的道路,文本可以“体验”而不必涉及其作者。福柯希望一切文本最终都可以用他所说的“低低咕哝的无名氏”来包括。归根到底,他不想知道“谁在说”,也不想知道作者写的哪一部分表达了他最深刻的自我。福柯问道:既然作者不能

说得真实,也不能说得独创,“谁在说,又有什么区别呢?”

解构主义者争辩说,语言就其本质而言是循环流动的,只能指涉其自身,不能指涉其身外的任何东西。解构主义者想知道,词语到底是指涉事物,还是指涉其他词语,抑或指涉这两者?他们说,因为文本的语言只能指涉其他语言和其他文本,绝不能涉及什么真实的超文本的实体,从总体来说,作品总是具有多重含义,它们可能相互抵触,互不相容,使“意义”难以确定,最终是牛头不对马嘴。这是他们喜欢的观念。极而言之,文本可以看作它自身多重意义的祭品。阅读文本就是一切,作者和他们实际生产的文本什么也不是。语言不再是一种风气或历史习惯的产物,反而仅仅变成一种隐喻——或者更明白地说,关于诸隐喻的隐喻——最后不但是不可认识的,而且也是无法解释的。读者变得比作者也比文本更重要,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独自任意解释文本。比如,批评家J. 希利斯·米勒^①实际上就在某个地方说过:“没有什么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只是一种文本效果。”奥斯卡·王尔德的说法可能更正确一些,他说:“因为(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里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他自己,所以他的戏剧彻底地向我们显示了他,把他的本性和气质向我们展露了出来。”

按照解构主义的说法,语言不能表达任何东西。他们愿意不断向我们举例说明他们的方法。这里就有一个。按照批评家莫瑞·克里格^②所说,对于“你看到我的要点了吗?”,一个女性主义解构者会认为这句话是用来破坏这位说话者的目的的,因为说的形象里包含了阳物崇拜的象征。我只能假设说一个以击剑消遣的男同性恋解构主义者会对“你看到我的要点了吗?”有另一种解释。毫无疑问,文学批评家的职能是解释普通人同他们自己语

① 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 1928—),美国文学批评家,解构主义批评的重要代表物。主要代表作有:《理论今昔》、《小说与重复》、《他者》等。——译注

② 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 1923—2000),美国文学批评家,教授。——译注